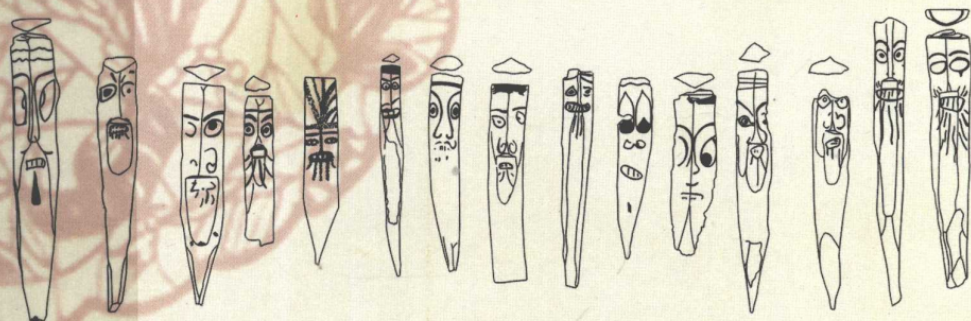


辽宁民俗

中国民俗知识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民俗知识

辽宁民俗

曲彦斌等 编著



目 录

- 一、辽宁地域文化概述 1/727
- (一) 辽宁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
发展走向 1/727
 - (二) 辽宁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多元结构 7/733
 - (三) 辽宁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 12/738
 - (四) 神秘的史前巨石文化 16/742
- 二、沈阳故宫与本土文化 27/753
- (一) “大清发祥地，两代汗王宫” 29/755
 - (二) 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各有千秋 32/758
 - (三) “大清门”与清代国号 36/762
 - (四) 脱胎于八旗制、“帐殿式”的大政殿和
十王亭 38/764
 - (五) 以“崇尚德政”为标榜的崇政殿 42/768
 - (六) 凤凰楼“紫气东来” 44/770



| | |
|--|---------|
| (七) 清宁宫：豪华的满族传统民居 | 46/772 |
| (八) 以文溯阁为主体的“宫中文化园区” | 50/776 |
| (九) “大十面”与“大世面” | 53/779 |
| (十) 故宫藏珍：鹿角椅、糠灯 | 57/783 |
| 三、一方水土一方人 | 62/788 |
| (一) “闯关东”与“沈阳城这疙瘩儿的人” | 62/788 |
| (二) 思乡心碎千古恨——张学良将军朝思暮想的故园： 辽宁 | 67/793 |
| (三) 一个曾经入主中原创造了“康乾盛世”的 “马背上的民族” | 72/798 |
| (四) 满族饮食文化的历史性嬗变与提升： 从民间到宫廷 | 82/808 |
| (五) 北方游牧民族的独特游艺：歙嘎拉哈 | 87/813 |
| (六) 锡伯族风情 | 91/817 |
| 四、多姿多彩的市井风情 | 101/827 |
| (一) 盛京庙会源流 | 101/827 |
| (二) 老沈阳各业店铺的老招幌 | 103/829 |
| (三) 老沈阳市井的四时叫卖吆喝与响器 | 121/847 |
| (四) 有关老招幌和招徕响器的民间传说 | 129/855 |
| 五、民俗语言中的民俗风情 | 133/859 |
| (一) 民俗语汇中的民族风情 | 133/859 |
| (二) “四大”格式的老“顺口溜” | 139/865 |
| (三) 俗语掌故中的人情世故 | 141/867 |
| (四) 风土谣谚中的“上梁”民俗 | 157/883 |



辽宁地域文化概述

一

(一) 辽宁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与发展走向

就辽宁的地理环境和位置这一“天然资源”而言，业已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辽宁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中国东北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的重要结合部。辽宁省陆地面积14.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5%。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山海关老龙头，大陆海岸线全长2178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12%；岛屿岸线长622公里，占全国岛屿岸线总长的4.4%。近海分布大小岛屿506个，岛屿面积达187.7平方公里。沿黄海的主要岛屿有外长山列岛、里长山列岛、石城列岛和大、小鹿岛等；



沿渤海主要岛屿有菊花岛、大小笔架山、长兴岛、凤鸣岛、西中岛、东西蚂蚁岛、虎平岛、猪岛和蛇岛等。

东北与吉林省接壤，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为邻，西南与河北省毗连，以鸭绿江为界河，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南濒浩瀚的渤海和黄海。辽宁是东北地区通往关内的交通要道，也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通向世界、连接欧亚大陆桥梁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中国地域文化或文化地理时，流行的说法往往以“民俗文化风情”为坐标，从地域上来划分成所谓“七大文化圈”分布^①。且不论其划分是否科学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东北部文化圈亦即如今也经常说的“关东文化”的地域范围与“游牧文化圈”，在地理范围上出现了重合交叉现象——都包括着现今的辽宁行政区域。单就关东文化而言，其重心或说是主干之所在，则是现今的辽宁行政区域的“辽沈文化”。“辽沈文化”，亦即辽宁的地域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事实从另一个视点说明，辽宁地域文化在东北地区，在“七大文化圈”分布中的重要位置。同时也反映着辽宁地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基本地位。

如果不能够十分理性地探讨、研究搞清辽宁地域文化发展战略的问题，理清思路，那么，所谓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振辽宁雄风”（或说是“再展辽宁风采”），很可能是一句大而无当

①所谓“七大文化圈”分布是：第一，东北部文化圈：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及内蒙古东部，其特点是满汉族风俗的大融合。第二，游牧文化圈：包括内蒙古大部、辽宁、河北、陕西三省的北部、宁夏北部及新疆，其民风强悍勇武。第三，黄河流域文化圈：大致北起长城，南至秦岭、淮河，西抵青海湖东，东及黄海，其特点是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第四，长江流域文化圈：位于秦岭、淮河以南，西藏至青海高原东侧，其特点是秀美精巧。第五，青海文化圈：主要是青海一带，其特点是藏族风俗同藏传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第六，云南文化圈：主要指云南、贵州的多民族聚居地，民俗文化千姿百态。第七，闽台文化圈：包括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其特点是保留中原古代风俗文化现象。



的空话，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辽宁地域文化以其自身的特点和优长，在中华文化的丛林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特定地位，主要是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和深厚的自然资源蕴藏。

说到深厚的自然资源蕴藏，应当指出的是，不单单是指山川、矿藏资源蕴藏，还包括地下各种可以转化为人文资源的古生物化石资源。这些资源的发掘发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全世界所瞩目。例如，震动全球学界的“辽宁古果”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发现于辽宁北票四合屯一带。这一成果曾被评为“1998年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和“1998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1年4月，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辽西早期被子植物及伴生植物群》一书首次系统报道了孙革率领课题组，自1986年以来在我国东北从吉林、黑龙江到辽宁西部地区对早期被子植物的长期研究过程，特别是详细记述了“辽宁古果”在我国辽西的首次发现，以及自1998年以来，孙革等科学家以“辽宁古果”为引线，深入探讨了早期被子植物在我国辽西地区被发现的地质、地理背景，论证了孙革等近年来提出的“被子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假说，并提出了一些有关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的新观点及新思想，论述了这项研究对恢复1.4亿多年前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古地理、古气候，找寻石油、煤等沉积矿产的重要意义。在有关被子植物起源的时间方面，以往国际学术界多认为最早的被子植物起源于距今约1.3亿年的早白垩世；但“辽宁古果”这一晚侏罗世被子植物在我国的发现将人们对被子植物起源时间的认识至少提前了1500万年。在起源地方面，以往欧美学者多流行“热带起源说”，认为被子植物起源于南美的热带高原或西南太平洋群岛；但“古果属”在我国辽西的发现却表明，包括我国东北、蒙



古和俄罗斯远东等在内的亚洲东部的中纬度地区，可能是被子植物的起源中心或起源中心之一。在有关被子植物起源的祖先类群方面，古植物学界以往多流行“真花说”或“假花说”；而“辽宁古果”的发现却表明，被子植物的祖先类群可能是现已灭绝的种子蕨类植物，且可能为水生；这在全球被子植物起源研究方面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在距今约1.45亿年时期辽宁北票四合屯一带，曾存在一个“尖山沟湖”，湖中曾聚集着相当丰富的双壳类、叶肢介、介形类鱼、龟等动物；湖边生活着大批恐龙及其他爬行类、鸟类及昆虫等。这些生物伴随“辽宁古果”等古老的有花植物，共同组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据从该地区发现的大量早生松柏类及买麻藤类植物化石，作者推测，亚洲东部晚侏罗世时期曾处于季节性干旱或半干旱的气候，火山活动又十分频繁；这种相对“恶劣”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可能促进了新物种的产生，最早的被子植物便可能由此产生。“古果属”化石的发现使中国的早期被子植物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项研究连同本书的出版，为我国辽西地区进一步成为国际古生物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2002年5月，孙革及其课题组又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第二篇封面文章，进一步报道了“辽宁古果”及“中华古果”在我国的发现和研究情况，以及“古果科”的首次建立。这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对探索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又如，辽宁朝阳发现的一种原始鸟类化石，是我国境内迄今所发现的最原始的鸟类——“原始热河鸟”。发现热河鸟最重要的意义是，它首次从鸟类化石的角度，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热河鸟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保留一根由20多枚尾椎骨组成的十分细长的尾巴，其原始的骨骼特征与奔龙类恐龙十分相似；此外，热河鸟的第二脚爪也特别发达，这一特征也与其他



鸟类不同，但却和奔龙类、伤齿龙等小型兽脚类恐龙相似；热河鸟化石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是它体内保存了许多植物的种子化石，表明这是一类以吃种子为生的鸟类。在我国发现的数百件鸟类化石中，这还是第一件保存了有关食性的直接的证据。非常有趣的是，热河鸟的牙齿已经退化，但是上下颌都十分粗壮发达，推测可能是为了适应吃种子的需要。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热河鸟体内的种子都比较完整，保留了比较新鲜的外表，这些种子大面积的分布，还说明热河鸟可能具有一个相当发达的嗉囊，负责储存和消化的功能。但这些植物的种子属于什么样的植物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和研究。据了解，原始热河鸟的原始性仅次于德国发现的世界上最原始、同时也是最古老的鸟类——始祖鸟。这一化石和著名的孔子鸟相比，特征明显更加原始，代表了鸟类早期演化的一个更加古老的祖先类型。

这里，还应特别谈到的是辽宁丰富的乡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以赵本山为代表的辽北小品，脱胎于东北二人转，是根植于东北特有文化的一种艺术样式，以其浓郁的原生态的地方乡土文化韵味，从1990年起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从而走向了全国，在全国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丛林中，独占鳌头，这也是获得众人认可的一种文化地位。新华社记者李善远、张非非在采访中了解到，东北气候寒冷，广袤的松辽平原一进入冬天就是农闲，漫漫长日，“猫冬儿”的人们靠什么过活？弄个火盆土炕上围坐一堆，唱地方戏“二人转”，讲故事、说笑话，你一句我一句，传统的，现代的，逗得大伙儿哈哈一笑，各种情绪、情感就都得到了宣泄。可以说，东北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逼生了属于北方特有的文化，辽北语言充满了生动、鲜活的因子，生命力非常旺盛。特别是地方戏“二人转”，男演员叫“丑”，女演员叫“旦”，三分“旦”七分“丑”，丑角在二人转里调解气氛，制造笑料。一串串即兴的说



口，非常生活化，加之东北人性格开朗、率直，说话一步到位，形成东北文化层里特有的幽默感。辽北小品艺术的生命线是语言，演员那一口地道的辽北方言，因其特有的语法、语音、语汇而具有一种穿透力，一张嘴就是一串串的疙瘩话、俏皮话、歇后语、练语，包袱抖得特别响，使观众深深地陶醉，从而以北方农民独特的幽默、夸张和滑稽瞬间征服了亿万观众。赵本山小品的语言特色，不但能准确掌握传统说口的节奏和韵律，还能根据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用现代词语以及乡村俚语创造出崭新的说口风格，语言节奏鲜明，十分上口，富有韵味，而且内含一种极富魅力的幽默感，一张嘴便妙语成珠，最没效果的词儿到了他嘴里也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喜剧效应，深得普通老百姓的喜爱。

辽北小品艺术的走红和“赵本山现象”的出现，尽管在各地还有争议，但已经在提示人们：在关注历史上的宫廷文化和各种高雅文化的同时，且莫忽略民间的通俗文化。辽宁民间文化资源和遗产远非二人转和新兴起的小品艺术，还需要全面普查，全方位地抢救、整理和利用，应当借助全国性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启动和运作，切实搞好本地区乡土民间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抢救。

“民俗旅游资源”是指可能用作民俗旅游观览、参与、体验、娱乐、采风（访问）、鉴赏等活动内容与形式的民俗事象及民俗形态。举凡民俗建筑、民俗设施、民俗景观、民俗文物、民俗活动、民俗艺术等民俗文化，大都可以成为用作开展民俗旅游的人文资源。民间文化是最基本的“民俗旅游资源”。民族性、乡土性是民俗的两个主要特征，这也是开发利用民俗旅游资源，使之成为地方旅游业的主导旅游项目和文化特色，脱离这两种重要特征，地方的民俗旅游便失去了根本。因而，开发利用民俗旅游资源，应着重于民族性和乡土性。合理开发利用民俗旅游资源，应全面把



握，整合规划，重点建设；以及以乡土为本，引进奇绝，突出精巧、典雅、灵活这样的一些特色，忌洋、忌全、忌大，以此为切入点，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发展。也就是说，要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发展文化产业。

（二）辽宁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多元结构

辽宁地区有着众多的考古文化遗址。例如，距今约28万年前的营口金牛山文化，距今5000年前的凌原牛河梁的红山文化，距今10万年前的朝阳鸽子洞原始文化，距今8000年前的阜新查海文化、长海小珠山文化（农渔猎混合型原始文化），距今8000年前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早期的亚洲最大的盖州石棚山的石棚文化，距今7200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等。沈阳新乐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的打制、磨制石器，以及细石器工具，手制夹砂陶等出土文物，大都制作得十分精美，展示了辽宁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类型物质文化面貌。其中，尤其是在金牛山古文化遗址的下部文化层中发掘出土了大批打制石器和骨器以及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是与周口店北京猿人时代相当的遗址，这就充分地证明了辽宁很早以前就是古人类最早栖息和开发地区之一。据对营



图1 牛河梁出土的玉凤



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左县鸽子洞、凌源八间房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晚期的人类生活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至少远在40—60万年以前，在辽宁这块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的生存、繁育，也就是远古的“辽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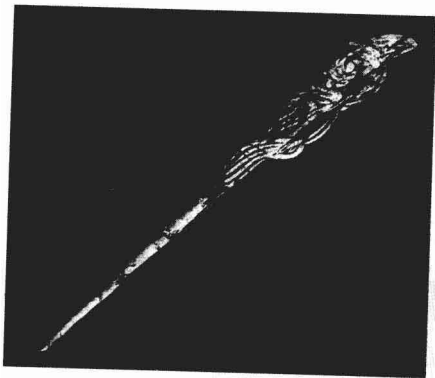


图2 新乐遗址出土的木雕太阳鸟

辽宁地域文化的多元结构形态，主要反映在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文化（主要是中原文化）的互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1. 考古文化所显现的多种经济文化的并存

辽宁自古就是多种经济文化并存的地区。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上，如辽河流域发现的多处农耕和渔猎的文化遗址，分布在辽西和北部沙丘草原一带的多处游牧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具体又如，新石器时代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特征的新乐农业文化，金牛山古文化遗址、喀左县鸽子洞遗址等所显示的狩猎文化，以及农渔猎混合型的长海小珠山原始文化等等。

2. 本地乡土文化与内地乃至海外邻国的文化互动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夏朝以来辽宁地区行政区划的辖属划分与变迁的历史。个中亦兼容着多种经济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结构形态。

据《禹贡》的记载，当中原建立了夏朝后，辽宁地区被划为隶属青州。商朝时，辖属于分封在辽西的诸侯。西周王朝，辽宁地区被分封给燕国管辖。于是，大约在公元4世纪前后，燕国大将秦开击败了当时居住在开原一带的东胡族部落，占据了辽河以东



地区，在辽阳西北与锦州西北分别设立辽东、辽西两郡。于是，燕（河北）、赵（山西）、齐（山东）等内地的移民纷纷前来这里定居，成为开发这块土地的早期内地移民。西汉时，在此设立了辽东、辽西和玄菟三郡。三国时，辽东为公孙度所占，辽西一度曾被公孙瓒割据。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马懿平定了辽东公孙氏的割据政权，从而实现辽宁与内地相统一的局面。西晋，辽宁地区隶属平中，分别隶属辽东、玄菟等郡管辖。但是，当时由于各族统治者互相争夺，这里又形成了分裂割据的格局。辽西地区先后经历了前燕、后燕和北燕3个小国的短期割据之后，合并于北魏。此间的辽东地区，则为新兴的高句丽贵族所割据。

隋朝建立（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之初，封高句丽为高丽王，对高句丽贵族在辽东的割据势力开始采取了承认现状的权宜之策，使辽东又暂时从割据局面恢复为一统。后来，隋朝虽然经过三次对高句丽争夺辽东统治权的战争，但均告失败。高句丽民族活动的许多山城遗迹，如今还散见于抚顺、西丰、桓仁、凤城、金县、新金、岫岩、盖县等地。

唐初，唐太宗李世民鉴于隋朝失败的教训，水陆并进、步步为营，逐渐地收复了盖牟（盖县）、卑沙（金县）、辽东（辽阳）、通定镇（新民）、怀远镇（北镇）等地，进而征服高句丽，于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设立安东都护府（治所设在平壤），辽宁东部所设新城、辽城、建安等都督府，皆归属安东都护府管辖。唐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在辽宁西部所设立的营州都督府，则划归河北管辖。唐朝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行政统治措施，对于使辽宁各族人民摆脱高句丽贵族的奴役，维护地方社会安定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及至“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随着松花江流域的渤海国地方政权兴起，其势力范围达到了鸭绿江流域和辽河的上游。



渤海国的鸭绿府、长岭府、扶余府，开始将丹东、抚顺、昌图等地纳入辖境。当时，经过本地的汉族、渤海族居民共同劳作，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冶铁经济的发展，呈现了辽宁东部地区的“东海文明”。由于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交往，使得中原文化大量地传入辽宁地区，因而也促进了本地社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当时渤海国同朝鲜半岛的新罗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有商务往来关系，又促进了本地与海外的文化交流。

再如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立之后，出于加快统一东北进程的需要即行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朝在这里设置了以辽阳为治所的辽东卫指挥司，下设25卫，2州。统辖范围所及，东至鸭绿江，西至锦州、山海关一带，南至旅顺海口，北面则至开原，几乎囊括了如今辽宁省辖境的大部分地区。

3. 多民族文化的并存和兼容

在历史上，辽宁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从远古时代开始，除了汉族作为先民的华夏民族而外，辽宁这块土地上还有东胡、肃慎等民族的先人在此生存、活动。由于各民族先人们的共同努力，同中原地区一样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积淀了本地深厚的原始文化。此外，高句丽文化、扶余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东藏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都主要存在于辽宁地域。特别是辽、金、元和清代，经过这些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时代，更加突出了本地区这种多民族文化共存和兼容的多元文化结构特点。辽金元以及清代，是辽宁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获得进一步开发的重要时期。期间，随着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人口的大批量迁入，本地人口剧增，社会经济、文化亦日趋繁荣。



公元10世纪初建立了契丹政权（即后来改称辽）的契丹民族，是生活在辽河上游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926年，契丹东灭渤海国之后，开始进犯中原并长期与北宋相对峙。辽政权把辖境划分为五道，道之下设立州和县。当时的辽宁地区分属于东京道、上京道和中京道三个道。

公元1115年，金统一了北中国之后，基本上沿袭了辽、宋旧制，当时的辽宁大部分区域归属于东京路统辖。当时开原以北地区以及辽河流域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垦，耕地面积扩大了，农业经济也随之发展。近年来新民、昌图、朝阳、绥中及凌源等地出土的大量铍、镰、锹、铡刀、斧、凿等金代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均显示着金代本地区农业、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公元12世纪末，新兴的蒙古族贵族趁着金朝势力日益衰朽之机迅速崛起，先后灭了西夏、金和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元朝。当时的辽宁东部地区隶属于辽阳行省的辽阳路和沈阳路，北部地区隶属于开元路咸平府；除大宁路及其属县隶属于中书省外，西部地区的广宁府路同样隶属于辽阳行省。元朝先后在金州、复州设立了屯田万户府，着力开垦荒地，推进辽南农业经济的发展，致使辽阳路、沈阳路、广宁府路逐渐形成为辽阳行省中最发达的农业区。辽东地区，由于农业定居民族的努力，使元初蒙古贵族在与金朝争夺辽宁统治权的战争中曾经一度荒废了的城镇和耕地得以恢复。辽河流域发现的金、元村落遗址，以及其他各地元墓发掘出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均显示了这一历史。同时出土的众多包括景德镇窑、钧窑、龙泉窑等元代瓷器，则显示了元代时辽宁地区同内地的商贸等物质文化的交流。



(三) 辽宁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

就近代而言，辽宁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二是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第三则是独特的乡土文化人文性格。

其一，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文化。

前面谈及，在历史上，辽宁是汉族在东北地区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聚居区。然而，后来的辽宁汉族人口，却主要是关内的移民。远在夏商时代开始，历代帝王就已经有意识地通过派员设郡、迁徙移民来治理关东这块黑土地。早在西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汉族人口相率逃往辽东避难，与辽宁各族人民杂居。鲜卑族建立前燕之后，又索性把由内地逃来的10万户流民，安置在辽西屯种，客观上促进了本地的经济开发和汉族与各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大规模地向沈阳等地的关外移民从汉代开始，但由于北宋之后本地少数民族势力的发展，来到这里的中原人口开始出现回迁或融入一些少数民族的趋向。到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沈阳城一举成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以来，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移民潮，源源不绝地涌向山海关外。

明代为了加强对辽东的统治和防御女真族及蒙古族的南侵，采取了修筑边墙和屯田措施。沿着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长达1700余公里的边墙，设有州卫以屯兵实边，致使移垦人日渐增多。特别辽南地区，山东移民经海上过旅顺登陆大量北上。这些移民的屯边措施，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时，辽东25个卫屯田面积已达2.1万顷，随后又发展到3.1万顷。大兴移民屯田之举，丰富了辽东农产品生产，在农业经济发展繁荣



的基础上，也使得本地以冶铁、制盐为主的手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当时，辽东的三万卫与四川的龙州、顺天的遵化一道，被号为三大冶铁中心而闻名全国。同时，东部山区的人参、貂皮和北部的马匹也开始与外地交流，发展繁荣了商品经济。

据有关历史文献显示，清代宣统年间，东北人口1841万，移民约有1000万，在所有移民中，山东人约占80%—90%，据此推算，清代东北的山东人即达到800万到900万之众。明末清初，随着清军的南下进犯，辽宁地区人口顿减。清王朝平定中原之后，则于公元1653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所招民每日给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给牛二十只，并“免交三年钱粮”。在如此优惠政策激励下，处于贫困之中的山东民众，据《东北开发史》记载^①，在清初招垦的23年中，“所招之民，山东居多”。尽管后来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东北禁封政策，但实际上已经阻挡不住山东等地流民“闯关东”的步伐了。而且，他们不再仅限于“栖息于奉天西南部金、复、海、盖等地”，而是“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蜂拥蚁聚，而长（春）而吉（林）而敖东，以至于图门江域”，足迹遍及东北各地。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空虚，财政困难，清政府对边疆的控制日益削弱，便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于是山东移民蜂拥北上，致使这一轮“闯关东”的浪潮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辽宁的黑土地接纳了“闯关东”的移民，“闯关东”的移民也为本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洒下了勤劳的汗水。同时，外来移民及其后代，与本地民族共同创造了辽宁地区以山东等地移民风情为基奠的、关内外相融合的辽宁乡土文化。

其二，以满汉融合为主导的北方多民族文化聚合。

^①孙为刚：《解读“闯关东”》，见《烟台日报》，2002-6-28。